

回顧香港開埠 170 多年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不難發現香港產業結構的演變有以下兩個重要特點：

第一，香港產業結構的演變具有其特殊性。18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初期，香港基本上屬於海島型漁農社會，其產業結構頗為簡單，是一個以漁農業為主的經濟體系，捕魚、農耕是經濟的主要行業，漁民、佃農、石匠和市集商販構成社會的主體。不過，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很快便被打破。1841 年 6 月 7 日，香港殖民當局宣佈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香港正式開埠。從 1840 年香港開埠到 1941 年日本佔領香港前夕的整整 100 年間，隨著香港作為遠東貿易轉口港地位的形成與確立，香港逐步形成以轉口貿易產業為主導，以航運、倉儲碼頭及船塢業和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為輔助的產業結構。這一時期，香港實際上已發展成為一個服務經濟體系。其產業結構的演化，並未遵循一般的發展規律，從第一產業部門轉移到第二產業部門，而是繞過第二產業部門直接跳躍到第三產業部門。這是香港產業結構演變的特殊性。

第二，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的 50 年間，香港經濟經歷了兩次產業結構轉型。20 世紀 50 年代，兩個特殊的歷史條件啟動了香港產業結構的第一次轉型。這兩個條件是：（1）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對華實施貿易禁運，受此影響，香港的轉口貿易一落千丈，傳統賴以生存的臍帶被卡斷；（2）受國共內戰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影響，20 世紀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上海以及內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業家移居香港，他們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及市場聯繫，為香港最初的製造業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兩個條件迅速推動了香港的工業化進程。這一時期，香港經濟起飛，並進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前列。香港產業結構的第二次轉型，發軔於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並在 80 年代中後期取得明顯進展，到 90 年代末趨於完成，轉型的基本趨勢是“經濟服務化”，即從原來的出口和製造業為

主的經濟模式，轉變為亞洲區一個與中國貿易和對外關係有著密切關係，由港口帶動並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這一時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香港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到內地，特別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雙方形成“前店後廠”的分工格局。這次產業結構的轉型，推動了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香港經濟的持續增長，並強化了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貿易中心、航運及航空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發展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服務經濟體系之一。不過，總體而言，戰後以來香港產業結構的兩次轉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動或刺激下，根據自身比較利益在市場機制下自動調節的結果，技術進步在其中的影響力不算重要，這直接導致了香港產業結構的缺陷和問題。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香港產業結構轉型中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主要是：香港經濟的“空心化”，製造業轉型升級困難、步伐緩慢，其經濟地位迅速下降，而香港與內地“前店後廠”分工模式的局限性也日趨凸顯；隨著勞動成本和經營成本大幅上升，香港轉口貿易開始轉向離岸貿易，香港作為內地對外貿易的傳統中介地位亦開始下降，經濟增長動力進一步受到削弱。這一時期，隨著經濟轉型，在多種複雜因素的刺激下，香港地產、樓市、租金大幅飆升，扯動香港股市大幅上漲，並帶動通貨膨脹再度攀升，地產、股市的異常繁榮又刺激銀行金融業的空前景氣，造成港元資產的急劇膨脹，產生整個經濟中的“泡沫”成分，進一步推高香港整體的經營成本，嚴重削弱香港經濟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還衍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包括結構性失業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不單直接影響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成為香港社會不穩定的重大因素。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不久，即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香港雖然成功捍衛了聯繫匯率制度，但面對亞洲外圍國家和地區貨幣的大幅貶值，其整體經濟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壓力和迫切性大大增加。推動香港經濟的升級轉型，邁向高增值經濟，以維持和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實際上已成為剛成立的香港特區政府、工商界以至整個社會的迫切任務。當時，董建華政府將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定位為“亞洲的首要國際都會”和“中國的一個主要城市”，並大力發展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業等四大支柱產業的產業政策。2008 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受此衝

擊，香港經濟從 2008 年第 2 季度起經歷了連續四個季度的衰退。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香港特區政府接納了香港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的關於發展六項優勢產業的建議，這些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檢測和認證、環保、創新科技，以及教育、醫療。

在既有資源稟賦的支持和特區政府政策的倡導下，回歸以來香港產業結構展開了第三次轉型升級，其基本趨勢是服務業進一步邁向高增值方向：其一，製造業式微，香港經濟演變成全球服務業比重最高的經濟體之一。其二，金融、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旅遊等四大產業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比重總體呈上升趨勢，成為香港服務業的主體。其三，特區政府倡導的“六項優勢產業”有所發展，具有一定潛力，但仍遠未能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根據筆者的觀察和研究，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以來的 17 年間，整體經濟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並未取得成功，經濟的新動力主要源自“中國因素”帶動的金融業和旅遊及相關產業。這一時期，香港的經濟總量被土地及人口均為香港一半的新加坡超越，香港經濟前景堪憂。

根據香港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筆者認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國際性金融中心，具有資金流通自由、金融市場發達、金融服務業高度密集、法制健全和司法獨立、商業文明成熟等種種優勢，最有條件發展成為亞洲區的全球性金融中心。香港最明顯的弱勢則是經濟體積小。因此，香港應深化與廣東珠三角地區，特別是深圳、廣州這兩大中心城市的金融合作，共同構建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並進一步強化自身的戰略地位，特別是致力於發展成為中國企業首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資中心、亞太地區首要的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全球主要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亞洲人民幣債券市場等，致力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中心；與此同時，應積極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物流中心、國際旅遊中心和國際創新中心的戰略地位，構建所謂“1+3”的產業體系，從而繼續保持和提高其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力。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經濟形勢，香港憑藉著自己特有的優勢，成功地進行了兩次產業結構的轉型，推動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躋身世界先進經濟體系之列，並從中演變出一套極富彈性和靈活性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積累了豐富的國際經驗，在國際經濟中確立了其獨特的角色和地位。應該說，香港有條件、也有優

勢成功實現產業結構的第三次轉型，從而建立其作為“亞洲的紐約”或“亞洲的倫敦”的世界大都會地位。

然而，值得強調的是，香港未來的發展實際上存在不少值得憂慮的深層次問題，一些令香港在過去數十年間成功發展的積極因素似乎正在消失。根據筆者的研究，香港要成功實現第三次產業結構轉型，其政策前提是：第一，採取有效措施維持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進一步改善投資營商環境；第二，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轉變“積極不干預”的思維方式，制定和實施“適度有為”的產業政策，積極推動經濟轉型；第三，深化與中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融合，重建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的戰略優勢。

當然，從當前香港的現實情況來看，香港要成功實施上述政策，面臨不少的困難和障礙。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認為香港經濟的最高峰已經過去，未來的發展很可能會走下坡路，問題是走得快還是慢。這種觀點並非沒有道理，實在值得引起警號。在亞太區的競爭格局中，香港將面對新加坡、上海甚至廣州、深圳的挑戰，如果應對不當，香港經濟從燦爛歸於黯淡絕非危言聳聽。因此，可以這樣說：香港產業結構的第三次轉型，前途是樂觀的，但道路卻是曲折的，或者說任重道遠，甚至可以說充滿不確定性。

本書根據筆者的上述理解，對香港自開埠以來 170 餘年，特別是二次大戰以來香港產業結構的演變、轉型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剖析；並根據香港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態勢對其未來的轉型進行展望。倘若讀者能從中獲益、受到啟發，筆者將深感欣慰。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要衷心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特別是要衷心感謝三聯書店常務副總編輯侯明女士和本書的責任編輯程豐餘女士、張煒軒先生。本書能夠出版、如期付梓、製作精美，是與她們的鼎力支持、熱忱協助和辛勤努力密不可分的。

當然，由於筆者水平有限，資料掌握未夠齊全，其中定有不少疵誤和錯漏之處，懇請識者指正。

馮邦彥 謹識

2014 年 5 月